

躬行践履： 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虞宁宁

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其中躬行实践、引领教育改革是基本的社会责任，但近年来，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多喜好纯理论的研究，对实践的关注不够，导致大量的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不能真正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难以推动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教育研究者的偏好：青睐理论

教育研究者应当既关注理论研究，又重视教育实践，但现实中，由于研究条件、考核机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教育研究者更多地偏好纯理论的研究，教育实践则明显不足，以致每年虽有大量的教育研究成果，但在推动教育实践的改革上缺乏力度。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梳理、发展和创新教育理论，更重要的是要运用科学、先进的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杰出人才。研究工作应扎根于实践，是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教育研究就要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事实上，以践行得真知，还只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含义，它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且往往被忽视的境界则是指教育研究者应躬行践履，运用研究的成果指导实践。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可以验证自身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只有将研究成果不断地付诸实践，推动实践的改革与创新，才能真正凸显教育研究的价值。

当前的教育研究者能够关注教育中的各种现象，探讨教育中的现实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革方案，但问题就在于，许多教育研究者都专注于理论成果的取得，对于研究成果出来之后，付诸实践的工作却关注得不够。虽然造成这种现状有各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教育研究者自身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教育研究者有义务承担起躬行实践的社会责任，从微观的教育教学实践入手，引领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而是历代教育家的优秀品质。

二、历代中国教育家的传统：知行合一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家注重融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于一体，秉持知行合一的理念。

他们注重教育实践，并不仅仅停留在以躬行得真知的层次，而是更进一步，事必躬亲地推广自己的教育理念，扩大教育范围，使更多的人受惠于他们的教育活动。

“躬行实践，乡人化之”，好的教育理论如果只是停留在头脑中，刊行于书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了解它，无法让更多的人真正受益，只有付诸实践，才能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教育是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只有把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研究成果再付诸于教育实践，才能改进教育教学，形成教育上的百家争鸣，从不同侧面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孔、墨，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朱熹、王阳明，清代的颜元以至近代的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等，无不如此。

孔子创办私学，广收门徒，讲“仁”道，育“君子”，是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先驱。墨家学团也是秉持墨子“兼爱、非攻，提倡节俭”的思想，从事教育活动。唐代韩愈，面对官学衰落，耻于相师的教育现状，著《师说》，倡师道，有力地扭转了唐代耻师的风气。他用自己的俸禄兴办州学，按照自己的教育观念亲自指导学生，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培养出李翱、皇甫湜、张籍等一批优秀的“韩门弟子”。^[1]宋代的朱熹、王阳明也都躬行践履，多处设学讲学，将自己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朱熹曾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亲自拟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并多次讲学，宣传“理学”思想，指导后生读书之法；王阳明一生讲学23年，有17年都是在从政之余躬行教育实践。无论是在贬谪的蛮荒之地，还是在任官的繁华之都；也无论是在清闲安乐之时，还是在繁忙忧患之中，他都不曾放弃讲授“心学”。清代的颜元，则亲自规划漳南书院的六斋教育，践行自己的“真学”“实学”教育理论，为当时的教育带来一种崭新的气象，并“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2]他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将自己的教育理论加以推广，又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教育理论。

近代的中国更是涌现出一大批知行合一的教育家，他们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进行教育研究；另一方面，又在更高的层次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点一滴地推动教育改革与创新。陶行知一生都在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正是在不断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并将其研究成果贯彻到教育实践中。他曾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开展“科学下嫁”活动、组办山海工学团、发起国难、生活教育社、收容战争难童，培养特殊人才。他践行的“小先生制”和“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在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以自己的点滴行为实践和推动着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之路。蔡元培力行北大教育改革、黄炎培主持职业教育活动、梁漱溟开展“乡村教育”实验、晏阳初倡行“平民教育”运动等等，他们都是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虽然他们的教育实践活动相对整个中国教育来讲是局部的、微观的，但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不可能教育全部的中国人，但对曾接受过他们教育的个体来说，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改变也可能是一生的。

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正需要这种躬行践履的执着和魄力，需要教育研究者更多地关注教育实践，着力推行新的教育理念和研究成果。因此，当代教育研究者应继承并发扬教育先辈的优秀品质，更多地关注教育实践，承担起躬行践履、引领教育实践的社会责任。

三、教育研究者的应然追求：躬行践履

“行动胜于空谈”。进行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要以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教育实践，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实现教育强国之梦。教育研究者因工作的性质，掌握大量教育信息，接触前沿理论成果，了解先进、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如果将大量的精力专注于纯理论研究，就容易忽视教育实践，使新的研究成果只停留于文字，不能付诸实践，也无法推进教育现状的改变。如何改变这种现象？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提倡教育研究者躬行实践。只有教育研究者躬行践履，将理论付诸于实践，才能引领整个社会的教育改革与创新。

之所以提倡教育研究者躬行教育实践，是因为：第一，教育研究者自身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独立的科研能力，长期专注于教育理论研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熟悉，相关知识储备丰富，研究能力强，观点前沿，对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做出分析和整理，并充实、完善理论研究成果。第二，教育研究者具备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客观优势，他们大多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身后有庞大的学术团队，与教育界人士有广泛的交流，借助这些优势条件，能够较为顺利地开展各种教育实践活动，从而推动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躬行践履，引领教育实践是中国历代教育家的优秀品质，也是时代赋予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教育研究者应当把躬行践履作为应然的追求，以自己的教育实际行动为中国教育改革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1]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76.

[2] 陈青之. 中国教育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79.

作者简介： 虞宁宁，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卢彩晨

责任校对： 周 鹏
